

60

東鄉縣文史資料

第四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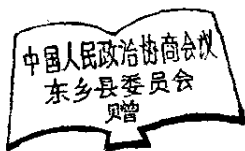
第四輯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江西省东乡县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东乡县文史资料

第四辑

(内部交流)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东乡县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一九九〇年三月

政协东乡县第三届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主任 陈接福
副主任 熊大桢
委员 陈其如 饶欣荣
乐松涛

东乡县文史资料

第四辑

主编 饶雪贵

副主编 熊大桢

东乡县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字数104千 印数1—1000

内部交流

目 录

忆东乡县农业基础建设·····	王 珍 (1)
红星今昔·····	陈其如 (15)
东乡工业的崛起·····	熊大桢 (31)
在艰苦奋斗中创业	
——兴建东乡糖厂的回顾·····	周 全 (45)
东乡化肥厂创业纪略·····	陈黄钟 (61)
回忆参加西进解放贵州·····	邓文祺 (71)
剿匪记	
——解放初在王桥区清剿向理安股匪的回忆	
·····	王 珍 (83)
解放前东乡行政机构变迁·····	熊大桢 (95)
东乡解放时见闻点滴·····	陈黄钟 (105)
东乡县信用社史略·····	陈其刚 (110)
忆东乡县立初级中学反贪污腐化反饥饿学潮	
·····	王 师 (117)
《东乡县地方戏曲略述》续编·····	梁腾洲 (122)
东乡县医院简史·····	东县人民医院 (133)

《东乡县文史资料》第二辑重要补正 (145)

编后语 (147)

忆东乡县农业基础设施建设

王 珍

东乡县领导同志多次约我写回忆录，我也感到在东乡工作20年，有这个义务。现就东乡发展农业基础设施建设问题作些回忆。

1949年8月，我随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南下干部大队来到东乡，先后担任过中共王桥区委书记、县委副书记、县委第一书记，1969年调离东乡。我在东乡整整度过20个春秋，可以说，东乡是我的第二故乡。在东乡工作期间，大多数乡村我都去过，各方面情况比较熟悉。据我所知：东乡县土地总面积1270平方公里，按土地类型可概括为：“六山半水二分半田，一分道路和庄园”。境内丘陵岗地连绵起伏，自然条件十分恶劣，解放前政治上又遭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残酷压榨，农业生产落后，粮食产量很低，农民长期过着糠菜半年粮的苦难生活。50年代初，我们下乡到农民家里吃派饭，一日三餐就有两餐是蒸菜饭（青菜、萝卜、芋头、红薯等杂粮掺和蒸煮而成），过去素有“东乡样样无，单出萝卜芋头薯”的贬称。据民间传说：民国时期买一个黄金埠的税官要2000块大洋，面买一个东乡县的县官只要500块大洋，因为东乡地方穷，油水不大，连旧官吏都卖不起价。

解放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推翻了三座大山，经过

土地改革，农民分得了土地，政治上翻身解放了，人人欢欣鼓舞。当时，我们每到一个村庄，到处都是欢歌笑语，家家户户贴着“翻身不忘共产党，幸福感谢毛主席”这一类的对联。在同农民的接触中，我们进一步了解到：农民的共同心愿是尽快治穷致富，发展生产，改善生活。农民的这种心愿，对做领导工作的人来说，是一个很大的鞭策，我们感到压力大，担子重，心里很着急。因为，解放初，东乡县的粮食亩产只有180市斤，工业几乎是一张“白纸”，全县的财政收入每年不过75万元，农民年人均收入只有35元，是全省有名的穷县之一。针对东乡贫穷落后的实际，我们感到要治穷，首先要将农业搞上去。在这方面，当时县委一班人同心协力，为东乡人民扎扎实实办了几件实事，回忆起来是很有意义的，对当今的农业开发具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一)

50年代初，东乡县委一班人通过一段时间深入基层访问考察，找到了东乡穷的根子在于农业长期处于落后状态，而农业上不去的主要原因又在于水的奇缺。因此，治水是当时农村工作急需解决的主要矛盾。为了解决这个主要矛盾，县委一班人查阅了许多历史资料，打开地形图仔细琢磨：东乡全境地处中、低丘地带，地势中部高，四周低，是全省唯一没有河流过境的县份，山塘小溪无济于事，据清·同治版《东乡县志》记载：“东乡依山为邑，土脉硗确，水泉不滋，又无河泊巨浸，泄有余而留不足”；“五日不雨而田涸，十日不雨而禾枯”。因此，50年代初，县委一班人率

领水利调查工作队100余人，分成几个小分队深入农村调查研究，踏遍了全县的山山水水，走访了千家万户。据调查统计，全县只有18000多口平塘，890多口山塘，加上小溪陂堰，蓄水引水不过2400万立方米，只能抗拒10来天的干旱，绝大部分田都是“望天埕”。记得珀玕乡农民对我讲过这样一个故事：清朝，于家与姜家两村农民为了争一口水塘，官司打到县衙，糊涂县官无法断案，提出那个村有人敢穿烧得火红的铁靴，水塘就归那个村所有。结果，于家村有位农民穿上了烧红的铁靴，送了一条命，争得了这口塘。可见东乡农民求水之心何等急切！我在南辽乡与农民座谈时，听到这样一首民谣：“江家陂江家陂，天晴车上晒（踩水车），大雨上楼梯（上楼躲洪水），有女莫嫁江家陂”。据调查，旱季，许多地方不但没有水灌田，连生活用水都十分困难；县城居民没有水洗澡，有些村庄农民要走几华里外去挑水吃，甚至分水吃。“水贵如油”这句话，对东乡一些地方来说，并不是夸张。

经过反复调查和广泛走访，使我们清醒地认识到，水利在东乡不仅是农业的命脉，也是工业的命脉，人民生活的命脉。没有水，农业上不去，工厂不能办，城镇难发展。因此，水，对于东乡发展社会主义经济至关重要。

要打好东乡农业翻身仗，当时第一位的工作就是解决水利这个主要矛盾。据我们分析，东乡雨量充沛，丘陵起伏，山坑盆地多，适宜兴建蓄水工程，如能把天上落下的雨水积蓄起来，既可抗旱又可防涝，一举两得。县委经过一段时间的探索与实践，果断地提出了“依靠群众，自力更生，逢坑作库，沿山开渠”的治水方案；之后，又坚定地贯彻执行中。

央提出的“小型为主，蓄水为主，社办为主”的治水方针，从50年代至60年代初，县委一直把水利建设摆在发展农业生产的重要议事日程，并一度集中主要精力，发动群众，有计划有步骤地大搞农田水利建设。回顾东乡治水的历程，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53年到1956年为试点摸索阶段；第二阶段，自1957年到1959年为决战阶段；第三阶段，1960年以后为巩固提高阶段。

1953年元月，全县土改复查一结束，县委书记丁碧岩同志和继任县委书记王世新同志，亲自主持兴建位于长林乡的佛岭水库。这座水库动员了全县1000多民工，干了一年零三个月建成，蓄水60万立方米，可灌田1000亩，是上饶专署投资兴建的第一座示范水库，也是全省首建的示范水库。它为丘陵地区搞水利建设作出了榜样，摸索了经验，锻炼了队伍，培养了人才，竣工当年，灌区农田粮食获得大面积增产，为东乡大办水利点燃了星星之火。

1955年，县委以佛岭水库为模式，兴建了蓄水200万立方米、灌田3000亩的象山水库；1956年，县委又决定兴建蓄水450万立方米、灌田5600亩的丁家水库。这两座工程都是一个冬春建成蓄水的示范水库，其主要经验是：加强党的领导，干部参加建库领导建库，依靠群众，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勤俭治水的精神，因此施工时间短、投资少、效益高，提高了农民治水的积极性。记得一次在象山水库工地上，一位民工对我说：“王书记，建这样的小水库，只能解决小面积，要是能建更大的水库，那就更好了”。这番话，反映了农民要求尽快解决水利问题的愿望。

从此以后，县委就开始酝酿兴建较大规模的水库问题，

在一次县委常委会议上，大家一致认为，东乡有必要、有条件、也有经验兴建较大的蓄水工程。到1957年，县委根据省、地水利主管部门技术干部提供的调查勘测设计方案，决定在长林乡金盆山峡谷建一座蓄水4800万立方米、灌田8万亩的中型水库——幸福水库。1957年9月破土动工，全县调集2万多民工上工地，经过百日大战，胜利地完成了大坝和主干渠道工程。按省、地委要求，提前2年竣工，受到了上级的表彰。次年（1958年），遇到夏秋两季大旱，幸福水库连续开闸放水100多天，保证了灌区8万多亩早稻喜获丰收。农民在大旱之年第一次见到粮食大丰收，从内心感到共产党为人民带来了真正的幸福。这座水库的建成，进一步锻炼了我们的领导作风，培养了更多的人才，积累了更加丰富的经验，使县委进一步增强了依靠群众，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办水利的信心。

1958年，在“大跃进”年代里，我们没有去搞什么高产“卫星”，虽然出去开会有时感到“坐冷板凳”，但我们并不介意，而是老老实实带领全县人民继续大办水利。从1958年冬到1959年春，先后建成了10座灌田万亩以上的骨干水库，32座万亩以下千亩以上的小型水库，完成土石方390万立方米，增加了蓄水量8000万立方米，解决了165000多亩耕地的灌溉问题。全部工程都达到当年开工，当年受益，加上原来兴建的水利工程，使全县70%的耕地面积达到自流灌溉，百日无雨保丰收。1959年全县粮食总产量比1958年增长49%，单位面积产量增长50%。这一下，江西日报社、江西广播电台的记者先后都来东乡采访。1958年11月，《江西日报》以整版篇幅介绍了东乡县治水经验，同时发表

了学习这个经验的社论。江西广播电台也进行了专题广播。但我们县委一班人的头脑并没有发热，而是更加冷静地对待水利建设中的成果和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坚持一抓到底，除了继续兴建蓄水工程外，又在地势低洼易涝的马墟、杨桥宋塘等地建立机电排灌设施，加固圩堤，搞好原有工程的加固配套。到60年代末，全县有中型水库4座，小（一）型骨干水库44座，小（二）型水库213座，蓄水总量达2亿多立方米，每亩耕地有水450立方米，比解放前每亩平均数增加了8倍，加上引水提水工程，有效灌溉面积达80%。据当时计算，每亩水利基本建设投资只花5.2元，是全省最低的。水库的建成，不仅能抗旱，而且还发挥了防洪作用。据水文资料记载，1957年以前，24小时内，降雨100毫米，北港中、下游低洼地区有1.5~2万亩农田受淹。从1959年开始，24小时内，降雨100毫米，低洼地区基本上达到洪水不出槽，不浸堤，不成灾。过去一季难保，如今双季丰收。1969年二季稻面积由1957年的2.3万亩扩大到28.2万亩。从而使东乡的农业生产进入了持续、稳定发展的新阶段。

（二）

水利问题基本解决之后，复种指数提高到170%，1958年，全县二季稻总产量达761万斤，比1957年增长2.8倍，单产比1957年增长44%；1959年，二季稻总产量达1824万斤，比1958年增长1.39倍，单产比1957年增长59.1%。东乡人民第一次夺得了二季稻的大丰收，在农业上打了第一个翻身仗。但是到了第二、第三年二季稻产量显著下降。当

• • •

时，有的二季稻田水旱无忧，禾却长不起来，杂草挤了禾，田里脚打滑，耘禾用耙挖。农民形容这些二季稻是：“六寸长的秧，八寸长的禾，只见草长不见禾，割谷可以不用箩，虽然离家二、三里，担谷肩膀不受磨”。这些话虽然有点夸张，但说明二季稻严重缺肥，产量确实很低，有的亩产只有百把斤。这些情况，使我们认识到农业要继续发展，主要矛盾又转化到肥料上。因此，我们在发展和巩固水利建设成果的同时，着力解决肥料不足这个突出矛盾。

肥料问题怎么解决？当时，县委的决策是：种（红花草）、养（猪）、积（农家肥）、造（化肥）并举，以农家肥和有机质肥料为主，发动群众，依靠群众，从实际出发，重点抓大面积扩种红花草。东乡历史上有种红花草的习惯，但那时由于水源奇缺，只能小面积种植，种一些耐旱的肥田萝卜或油菜小麦混播（俗称菜麦），全县种植面积最高的1953年为8万亩，少的年份只有2万亩，每亩鲜草产量只有600~700斤，而且肥效低，远远不能满足水稻两季亩产用肥的要要。如今水利条件好了，有利于大面积扩种红花草。于是，我们县委就集中精力抓种红花草。开始时，重点放在水利过关比较早的孝岗、长林、南辽、东源、马墟、小璜、邓家等地扩种红花草。那时，我们在这项工作中确实花了一番功夫，搞规划，抓良种，发动群众精心种好、管好。由于红花草的高产带来水稻丰收，农民尝到了甜头，种红花草便逐步成了他们的自觉行动。后来，水灌到那里红花草就种到那里。1958年，冬种红花草面积14万亩，1959年增加到24万亩，1960年又增到35万亩。至此，全县基本上实现了水稻田前作绿肥化。

红花草大面积扩种起来了，如何夺取红花草高产，又是一个新课题。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在总结群众经验的基础上，采取以磷增氮，以小肥养大肥的措施，要求做到“三个四”（每亩4斤种籽，40斤磷肥，4担火土灰），保证红花草播种质量，加上精心管理，全县红花草普遍提高产量，亩产鲜草4000~6000斤，有的高达8000斤。春耕时，有一次我在老虎岗田畈检查生产时，拔起一根红花草足有齐腰高。

为了巩固和发展种红花草的成果，我们要求10亩红花草田有1亩留种田，同时对红花草留种采取了一些优惠措施：种籽折价计算粮食产量，每亩折稻谷200市斤；每亩红花草留种田供应化肥10市斤。这样红花草留种问题得到了解决，种籽不仅完全自给，而且有余。

回想起来，我们在水利问题基本解决之后，狠抓扩种红花草这项工作，确实尝到了甜头，也得到了省、地委的肯定。当时，中共上饶地委书记彭协中同志对东乡大面积将肥田萝卜改种红花草很感兴趣，并要全区各县领导同志到东乡实地参观。1960年3月2日，南方13省（市）绿肥生产经验交流流动现场会，分别在萍乡、乐平、东乡召开，国务院农业部副部长何基沣率领出席会议人员参观了我县孝岗镇、马墟等公社的绿肥和幸福水库，何副部长高兴地说：“你们的红花草的确长得不错，几乎都有三道弯，三尺多长，田里象铺了一层厚厚的绿毯，看来粮食大丰收大有希望。”遵照领导同志的意见，我还在这次现场会上就治水、改土和绿肥高产问题作了汇报。

在抓好扩种红花草的同时，还注意发展养猪，圈猪积肥，广辟肥源，大搞农家肥料。同时，县里还办了一个氮肥

厂和一个磷肥厂，这样既有有机质肥料，又有无机质肥料，农民高兴地说：现在种田既有“洋”肥，又有土肥，粮食增产大有希望了。

(三)

事物总是在不断解决矛盾中前进的，随着水肥问题的解决，水稻能喝足吃饱了，粮食生产连续几年取得了比较好的收成，但如何使粮食平衡增产又是一个突出矛盾。我们分析了当时的情况，主要有三个矛盾：一是早稻与二季稻单产不平衡的矛盾；二是远田与近田产量悬殊的矛盾；三是扩大再生产与资金不足的矛盾。省、地委领导认为东乡县委的分析反映了客观实际，并转发了我们组织粮食平衡增产有关问题的分析材料。据当时统计：全县粮食亩产在300市斤左右的低产田有26万亩，约占总耕地面积的一半。这些田大多分布在人烟稀少的9个大畈和297个山坳里，群众把这些田称为“乌鱼头”、“野鸡脚”、“望天坵”。这些低产田明显地拖了全县夺取粮食稳产高产的后腿。

当时，我心里很着急，觉得不采取特殊措施不行。要把这些低产田的粮食产量搞上去，必须深入农村，到田间去与社员一道干。我把这些想法与孙国庆（县委书记处书记）、陈接福（县委分管农业的副书记）2位同志商量，他们很支持我的意见。接着又把这个意见提交到县委常委会上讨论，大家都表示赞同和支持。1959年春节一过，紧张的备耕开始了，我就和县委办公室几位同志，背行李，带劳动工具和学习材料到全县著名的低产畈——长林公社乌岗岭（有水田面

积5000亩)建起了茅棚,挂起了“中共东乡县委改造低产田指挥部”的牌子,在那里安营扎寨,与老农、农业技术员一道种试验田,搞千斤亩,抓丰产片,搞园田化,扩种红花草,办养猪场。这样实实在在地干了一年,乌岗岭的旧面貌大变样,粮食产量翻了一番。我和农业技术员邓源泉、老农胡龙仿种的一亩试验田粮食亩产达1200多市斤。领导干部在田畈安营扎寨,不仅改造了低产田,也改进了领导作风,密切了党群关系。当时,群众把我们住的茅棚称为“革命棚”。1961年,《江西日报》和《人民日报》都刊登了《革命棚》这篇短文。事实证明,只要下决心改造低产田,粮食产量是可以搞上去的。这时,我们县委因势利导,及时在乌岗岭召开了低产田改造现场会,推广了这里的经验,并向全县人民发出了“向低产田进军,向落后田要粮,向高产田跃进”的战斗号召,从此,全县打响了建设稳产农田的战斗。

当时,县委要求:除分管工业和机关工作的同志外,县委常委每人改造好一个面积5000亩的低产畈,公社党委委员每人改造好面积1000亩的低产片,大队党文部委员每人改造好一个面积500亩的低产垅,生产队长种好一片丰产田。分片包干之后,各级干部都迅速地蹲下去了。县长杨福行在虎墟公社的邱家咀,县委副书记陈接福在小璜公社的古楼岗,县委副书记梁花谋在东源公社的杨泉畈,县委常委危繁盛在孝岗镇的老虎岗。当时全县各级干部和农业技术员有3500多人在297个茅棚里,抓10万亩低产田的改造工作。我也由长林公社的乌岗岭转移到虎墟公社万亩低产田的黄陂畈蹲点,全县低产田改造指挥部就设在这里。我与农业技术干部蔡衍泉、老农饶道明和社员一道分析了这个低产畈的特点,排灌

渠系不配套，漫灌串灌严重，肥料大量流失，降低了水温，影响禾苗生长；田间道路弯曲狭窄，远田运肥难；土壤板结，有机质缺乏，群众称黄鳅暇的土壤是“晴天一块铜，下雨一包泥”。针对这些实际情况，我们和社员一道，平整土地，修机耕道，建立排灌渠系网络，沿山开渠，逢坎植树，防止水土流失；在低产田中办起了养猪场，大养其猪，深耕改土，扩种绿肥，增加土壤有机质肥料。

在水肥条件逐步改善的条件下，水稻品种又不适应高肥的新条件，倒伏严重。当时，我与农业技术员叶君惕对种子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归纳了这么几句话：“赣农严重混杂，南特号普遍退化，二晚久用老种，一晚红白交叉”。为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在黄鳅暇进行矮秆良种试验，获得了高产。这时，我们县委就开始从外地引进矮秆南特号、广福九号、珍珠矮、广陆矮、5450、早广二号、农垦58等水稻优良品种，在全县全面推广。由于我们采取了山、水、田、林、路综合治理的措施，效果比较明显，实现了平衡增产。1965年，全县粮食总产量达2.1亿斤，比1962年1.3亿斤增长61%，低产田里飞出了金凤凰，粮食产量又上了一个新台阶。

(四)

回忆起来，在加强水、肥、土等农业基础建设的同时，我们县委一班人也较早地注意到发展工业。比如，为了促进粮食高产，仅有农家肥料还不够，需要有化肥辅助；为了解决农副产品特别是甘蔗加工增值，又需要机械加工业；为了深耕改土，急需发展农机具修造工业等等。当时，县委深深

感到，要发展农业，没有工业的支援是不行的。东乡解放初，全县只有一台老掉牙的煤气机，工业几乎是一张“白纸”。当时，要办工业困难不少，无能源，缺资金，又没有技术力量。但是，有利条件也不少，县境资源条件比较好，有铜、铁、煤炭、瓷土等矿藏；粮食、甘蔗、油料等农作物很有发展前途；浙赣铁路线和南张、东临公路干线横贯县境，陆路交通比较方便；县城周围建成了几座较大的水库，工业用水可以基本解决。解放前，东乡工业虽是一张“白纸”，但白纸上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只要我们充分利用有利条件，克服困难，发展工业是大有可为的。

发展工业走什么路子？当时县委的指导思想是：围绕农业办工业，办好工业促农业。除了发挥地方资源优势，就此取材开办县属工业外，力争中央、省、地在东乡投资兴办现代工业。

1958年，我听到省委方志纯同志说，江西分到一套合成氨小化肥机械设备。当时，县委就这一信息作了研究，争先向省中请要这套设备。后来，全省好几个县争着要，省里有关部门也有不同意见，有的同意给东乡，有的认为东乡是穷县，条件差，不宜建化肥厂。县委曾派分管工业的同志多次到省里领导汇报我们办化肥厂的有利条件和克服困难的决心，据理力争。当时，省长邵式平同志问省政府主管化学工业的重工业厅的主要领导同志：“全省是谁先报名要设备？”这个厅的回答是“东乡”。邵省长果断地拍板说：“那就给东乡嘛！”就这样，全省第一套小化肥设备给了东乡，从而办起了化肥厂。

糖厂也是在省、地委领导的支持下，我们主动争来的。